

论衡选注



论 衡 选 注

《论衡选注》小组

北京人民出版社

论衡选注

《论衡选注》小组

*

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1.75印张 223,000字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11071·64 定价：0.84元

前 言

一千九百年前，在中国儒法斗争史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王充。《论衡》一书就是他在同汉代儒学的斗争中写下的一部重要的尊法反儒著作。这部著作对于我国后世法家和进步思想家的反孔批儒斗争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为我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王充（公元27—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县）人。他出身于地主阶级中政治、经济地位较低的“细族孤门”家庭，曾做过东汉的地方官吏，因为和世家豪族统治集团的政见不合，在他们的排斥和打击下，弃官还家。王充一生主要是从事理论斗争，先后写成了《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和《养性》等书，但保存下来的只有今本《论衡》一书中的八十多篇作品。

毛主席指出：我国历史上“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王充生活在东汉前期，这时正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绿林、赤眉等农民大起义之后。这次农民

211062

大起义，不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沉重地打击了世家豪族的反动统治，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当时那种土地高度集中和大量占用奴婢的局面，而且在思想上也猛烈地冲击了阻碍社会前进的孔孟之道，从而促进了东汉前期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特别是农学、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和药物学等，都有较大的进步。然而“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同上）。在镇压农民起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汉政权，是一个以世家豪族为主要统治力量的封建政权。随着世家豪族势力的逐步膨胀，阶级矛盾也逐步激化。东汉王朝的一些宗室、功臣和外戚，肆无忌惮地实行兼并，这不仅剥夺了广大农民的土地，同时也损害了中小地主的利益。到了汉章帝时期，世家豪族的土地兼并已经达到相当惊人的程度。例如济南王刘康一家就占有私田八百顷，奴婢一千四百人，厩马一千二百匹。世家豪族倚仗“阀阅”（门第等级），通过“征辟”（征聘）、“选举”（选拔）等各种途径，把持着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形成庞大的世袭的官僚特权统治集团，借以维护和扩大他们既得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思想领域，他们进一步尊儒反法，神化孔丘，大搞讖纬迷信，竭力为豪门贵族特权统治的神圣性和永恒性制造理论根据。公元79年，汉章帝刘炟（dá达）召集群儒，亲自主持召开“白虎观会议”，在董仲舒反动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儒家经

典和讖纬迷信结合起来，抛出了《白虎通义》这部集汉代儒学之大成的官方法典，作为他们维护贵族豪门的特权，奴役和欺骗劳动人民的思想武器。这样一来，不但加剧了广大农民和豪族地主之间的矛盾，而且也加深了地主阶级内部豪族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间的矛盾。王充的法家思想，正是东汉前期这种阶级矛盾和斗争在政治思想领域的反映，是当时地主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政治、经济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

王充的一生是反豪族、反儒学的战斗一生。他作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在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的历史条件下，第一个公开举起反孔的旗帜，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朴素唯物主义的理论，批判了从董仲舒到《白虎通义》所宣扬的复古倒退和唯心主义的反动谬论，打击了豪族地主的特权统治。

王充猛烈地抨击了东汉世家豪族的政治特权和土地兼并，揭露了豪族统治的专横和腐败。他指出，豪门贵族“一旦在位，鲜冠利剑，一岁典职，田宅并兼”（《程材》），“清廉之士，百不能一”（《遭虎》）。他认为这都是东汉统治者“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不睹所趋”（《自纪》）所造成的恶果。东汉反动的门阀制度，使得“庸人尊显，奇俊落魄”（《自纪》）。他尖锐地指出：“鸟无世凤凰，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自纪》），强烈地要求打破豪门贵族世代把持政权的局面，实行“任贤使能”的法家路线，反映了中小地主要求革新、前进的政治愿望。

王充的反孔斗争是与他反豪族的政治斗争密切联系的。东汉反动统治者和儒生把孔丘抬到不可侵犯的“神”的地位，“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反对党八股》），借以从政治上思想上强化豪族地主的专政。在这股猖狂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中，王充在西汉末年广大农民反孔斗争的影响下，发扬了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写出了《问孔》、《刺孟》、《实知》、《知实》等讨伐孔孟的檄文，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被东汉儒生所神化了的“圣人”孔丘。王充首先针对东汉儒生吹捧孔丘“所言皆无非”的谬论，尖锐地指出：孔丘的话，是“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孔丘的为人，是“言无定趋”，“行无常务”，并大胆地喊出了“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的战斗口号。关于孟轲，王充也同样指出：他的言论，“违道理之实”，尤其是他的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说教，更是违背历史的“浮淫之语”，指出孟轲是一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而那些被孔孟之徒奉为“圣道”的儒家经典，大都是一些“溢增过其实”的“伪书俗文”。王充还针对《白虎通义》把孔丘等“圣人”说成“神而先知”的谬论，明确地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生）知者”，并用事实证明孔丘并非是“不学自知，不问自晓”的神人，而是和普通人一样，“知物由学，学之乃知”。这就进一步从认识论上戳破了孔丘的神圣偶像，揭穿了所谓孔丘“为汉制法”的骗局。这种批判，针对的虽是被东汉儒生所神化了的孔丘，而刺痛的却是当时享有特权的世家豪族地主，具有现

实的政治意义。对于后世刘知几、李贽、章太炎等进步思想家的反孔斗争，也有较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王充才遭到历代反动统治者的围攻和谩骂。他们把王充视作“非圣无法”的“名教之罪人”，诬蔑他的《论衡》是“妖变”，这恰好从反面证明了王充批孔反儒的进步意义。

必须指出，王充是在地主阶级由先进转向保守反动的历史条件下，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批孔的。他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了孔丘言行的矛盾、言论和事实的矛盾以及言论本身的矛盾，而没有从政治路线斗争的高度彻底破除对孔丘这一偶像的崇拜，他还承认孔丘是“圣人”，是“道德之祖，诸子之中最卓者”（《本性》），从而对孔丘的某些言行也有所肯定。这就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批判孔孟之道，只有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抓住路线问题，抓住它复辟倒退的反动实质，才能击中要害，批深批透。

王充从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进步立场出发，在对孔孟等儒家偶像进行尖锐批判的同时，还程度不同地肯定了商鞅、韩非和秦始皇等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历史作用，热情地赞扬了秦汉之际法家人物的“功奇行殊”（《齐世》）。特别是他对汉代反动儒生刮起的那股攻击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复古妖风，进行了有力的回击。他指出，秦始皇所以焚书，是由于反动儒生攻击郡县制，鼓吹分封制；而坑儒则是因为“诸生为妖言”（《语增》）。对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一镇压奴隶主复辟的重大革命措施，作出了比较正确的评价。但是，也必须指出，王充在称赞这些法家的历史功绩

的同时，对他们也都有一些错误的非议，特别是他对韩非、商鞅等人的某些批评是错误的。这主要是由于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决定的。

列宁指出，唯心主义“就是反动派的武器，反动派的宣传工具”（《我们的取消派》）。东汉反动统治者和儒生，为了巩固和发展他们的政治和经济特权，便从董仲舒那里搬来经过改造了的孔孟的天命论，大肆宣扬“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他们把天说成是有意志的、能赏善罚恶的至上神，是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之祖”，而帝王则是天在人间的代表；把编造的讖纬之言说成是上天的意旨，把自然界的一些灾异现象说成是上天的谴告，竭力贩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货色。

王充在反对儒家“天人感应”说的斗争中，继承了先秦荀况、韩非的思想和西汉初年的黄老之学，利用了两汉时期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成果，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元气论。他在《自然》、《谴告》等篇中指出：天和地一样，都是由“自然无为”的“元气”构成的，根本没有什么“利欲”；世间万物和人类也不是由天有意识、有目的地创造的，而是“天地合气”自然产生的；即便是封建帝王，也“性不异于物”。这就驳斥了“天地故生万物”、“天地故生人”和“君权神授”的谬论。既然天是“自然无为”的，所以它也就不会谴告人君；各种灾异的出现，如日食、月食、地震、雷雨、水旱、虫灾等，都是由于“风气不和”而形成的自然

现象。王充还明确地指出，儒家鼓吹的“讖书秘文”，都是后人编造的“神怪之言”（《实知》），“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时而应人”（《明零》），所谓“天人感应”，不过是反动儒生“欲化无道、惧愚者”而编造的“衰乱之语”，都不可信。尽管王充还不能从当时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高度揭露儒家“天人感应”说的反动实质，但他的批判在当时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王充从朴素的唯物主义元气论出发，针对东汉反动统治者所宣扬的有神论，进一步发展了战斗的无神论。他根据当时的科学成果，写出了一系列犀利、生动的文章，全面地批驳了鬼神迷信。他在《论死》篇中指出，人是禀受“元气”而生的，人的精神是离不开形体的。他说，“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这种“精神依倚形体”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对于后世（范缜等）的战斗无神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王充明确指出：“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人活着也不能“得道成仙”，“物无不死，人安能仙？”（《道虚》）王充还引用大量的事实证明所有的鬼神迷信都是“失实之言，不验之语”（《死伪》），一切祭祀鬼神的迷信活动，都“不可信用”（《辨崇》）。

王充对于“天人感应”、鬼神迷信的神学世界观的批判，具有鲜明的反豪族的社会政治意义。王充的这些战斗的无神论著作，对于我们今天在不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条件下，不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和斗争，揭露阶级敌人利用宗教迷信搞资本主义复辟的罪恶活动，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但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和当时生产规模的狭小，王充又承认祥瑞、妖鬼的存在，相信“禄命骨法”，没有彻底同有神论划清界限。特别是他看不到人民群众是推动世界历史前进的伟大动力，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历史观上陷入了唯心主义的自然命定论。讲到国家的“昌衰兴废”，他说：“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治期》）讲到人们的富贵贫贱，他说：“贵贱在命，不在智愚；贫富在禄，不在顽慧。”（《命禄》）这种自然命定论，就其思想实质来说，是神秘主义的，是为剥削制度作辩护的。显然用这样的思想武器是不可能彻底批判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也是不可能完全战胜孔孟之道的。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上。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只有“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努力改造世界观，才能用马克思主义这一锐利的思想武器，彻底批判包括孔孟之道在内的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

从王充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随着地主阶级由先进向保守、由革命向反动这一历史地位和作用的变化，豪族地主阶级便把原来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孔孟之道，经过董仲舒到“白虎观会议”不断的加工，改造成为地主阶级服务的统治思想。这说明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有共同性。新的剥削阶级总是利用旧的剥削阶级思想，来维护它的反动统治。这对于我们认识现实的阶级斗争很有启示。在社会主义社会，新老资产

阶级分子以及他们在党内的代理人刘少奇、林彪一类，总是热衷于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和“弊病”，疯狂地鼓吹孔孟之道，竭力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我们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用马克思主义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 * *

我们这里从《论衡》一书中选注了比较集中地反映王充进步思想的十二篇文章。在注释体例上，为了方便广大工农兵的阅读，我们采取了说明、原文、注释、按语和今译相结合的办法。在校勘方面，以明刻通津草堂本为底本，参照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七四年出版的《论衡》新校本，此外也参考了前人研究的成果。凡是采用上海本的地方，迳改原文，不再出注；凡是另采用前人说法的地方，迳改原文，加注说明；凡是新作作的校订，用〔 〕标出，原文用（ ）括起，并加注说明。

参加本书选注工作的有北京市总工会工人理论组、北京人民印刷厂、北京工艺美术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北京液压件厂、北京维尼纶厂、北京卫戍区 4792 部队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工人、解放军、工农兵学员、干部和教师。北京低压电器厂和北京卫戍区 4879 部队派出工人

和战士参加了本书的编辑工作。初稿完成后，曾先后多次到工厂、农村、部队、学校和有关单位广泛地征求意见，得到工农兵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谢意。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希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论衡选注》小组

一九七五年六月

目 录

问 孔	1
刺 孟	61
实 知	95
知 实	130
语 增 (节选)	167
齐 世	174
自 然	198
谴 告	229
论 死	253
道 虚 (节选)	278
辨 崇	299
自 纪	316

问 孔

【说明】《问孔》是自西汉后期地主阶级由尊法反儒变为尊儒反法以来第一篇反孔的法家杰作。

东汉反动统治者，为了强化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专政，维护豪族地主的世袭特权，进一步尊儒反法，大搞尊孔活动。汉章帝刘炘亲自纠集儒生炮制了一部尊孔法典——《白虎通义》，把孔丘神化成了“道无所不通、明无所不照”的“圣人”、把儒家经典法定为后世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面对这股猖狂的尊孔逆流，地主阶级革新派的代表王充，便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的祖师爷孔丘和被东汉统治者钦定的教科书——《论语》。他揭露了孔丘有关忠、孝、仁、信、礼等伦理道德方面言行的矛盾和虚伪，驳斥了孔丘天命说的混乱与荒谬，戳穿了孔丘打着“行道”的招牌，骗取“君子”美名的伎俩，指出了孔丘是个“贪官好仕”、“行无常务”、“言无定趋”的政客。王充针对着孔丘言论的自相矛盾和他的言行不一，响亮地提出了“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的战斗口号，有力地反击了东汉统治者对孔丘的吹捧和神化，打击了东汉儒生这群“好信师而是古”的复古狂，并给了后代法家反对儒家的斗争以很大的影响。

但是，王充的反孔是从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出发的，他反对东汉统治者和儒生借用孔丘的亡灵来维护豪族地主的政治和经济特权，反对复古倒退，主张革新前进；他认为只有“任贤使能”，才能“治定功成”，才能维持封建王朝的长久统治。这些都是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对于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要求，这与农民阶级的反

孔是根本不同的。正是由于王充这种剥削阶级的立场，决定了他只能采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揭露孔丘言论的自相矛盾，而没有也不可能从政治路线的高度揭露孔学的反动实质。彻底批判孔孟之道的历史任务，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才能完成。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①，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②，不知难问③。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④，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⑤，安能皆是？不能皆是，时人不知难；或是而意沉难见，时人不知问。案贤圣之言⑥，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

论者皆云：孔门之徒⑦，七十子之才⑧，胜今之儒。此言妄也⑨。彼见孔子为师，圣人传道必授异才，故谓之殊。夫古人之才，今人之才也。今谓之英杰，古以为圣神，故谓七十子历世希有⑩。使当今有孔子之师，则斯世学者皆颜、闵之徒也⑪；使无孔子，则七十子之徒，今之儒生也。何以验之？以学于孔子不能极问也⑫。圣人之言，不能尽解，说道陈义，不能辄形⑬。不能辄形，宜问以发之⑭；不能尽解，宜难以极之。皋陶陈道帝舜之前⑮，浅略未极，禹问难之，浅言复深，略指复分⑯。盖起问难⑰，此说激而深切，触而著明也⑱。

孔子笑子游之弦歌⑲，子游引前言以距孔子⑳。自今案《论语》之文，孔子之言多若笑弦歌之辞，弟子寡若子游之难，故孔子之言遂结不解㉑。以七十子不能难，世之儒

生，不能实道是非也。

凡学问之法，不畏无才^②，难于距师，核道实义^③，证定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时也，世之解说人者^④，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⑤，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谓问孔子之言，难其不解之文，世间弘才大知，能答问解难之人，必将贤吾难问之言^⑦。

【注释】

- ① 是古——迷信古代。是：肯定，这里引申为“迷信”。
- ② 专精——专心致志。
- ③ 难——反问。
- ④ 详审——周密。
- ⑤ 仓卒（cù 促）吐言——匆忙中讲的话，这里是指《论语》而言。因为《论语》是记录孔老二及其门徒当时言行的一本书，与上述“用意详审”的专门文章不同。仓卒：匆忙。
- ⑥ 案——检查、考查。
- ⑦ 孔门之徒——孔丘的门徒。孔丘（公元前 551—前 479），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人。他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反动儒家学派的创始者，是一个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他的思想和言行，主要记载于《论语》一书中。
- ⑧ 七十子——据说孔丘有七十二个“高才”弟子。七十子是概称。
- ⑨ 妄——荒谬。
- ⑩ 希——同“稀”，少。
- ⑪ 斯世——当代。颜、闵——即颜回、闵子骞（qiān 千），都是孔丘的门徒。